



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

黄益平

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对此作出重要论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强调“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发展数字经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中要求“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深刻把握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理解全要素生产率，首先需要理解生产率这个概念。生产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常用于衡量单位投入的产出水平。从投入的角度看，生产率可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前者指产出与一种要素投入之比，比如劳动生产率为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后者指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包括资本、劳动、能源及其他要素等两种或多种要素的组合。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自提出以来，不

少经济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和计算方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余值”。总的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除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所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反映了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决定着经济内涵型发展水平和潜在增长率高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在给定的要素投入水平下，通过改善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增加总产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继续保持稳定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并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都缺乏增长动力，无法持续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主要通过模仿式创新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在达到中高收入阶段后，却难以通过原创性创新来转变发展方式，最终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相伴的，正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或者停滞不前。而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一般来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动力。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加强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生产过程更加集约高效，并减少对资源要素投入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能够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与创新配置，进而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制度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能够完善市场机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技术扩散、消除市场扭曲；同时，推动企业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更好适应市场变化。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开放效应。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能够通过国际经贸网络促进贸易流动、资本跨境配置、技术扩散外溢等。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也能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设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四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是知识创造与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加大教育投入与技能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的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增强劳动者与岗位需求的适配性等，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出发，运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在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吸引和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走出了一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参与全球分工推进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从供给侧看，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资本充裕度不断提升以及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加之能源、土地供给和生态环境

约束加剧，继续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从需求侧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在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加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加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给我国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要摆脱粗放扩张的生产力发展传统路径，必须积极拓展先进生产力发展空间，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创造和扩大新的市场需求。破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尽快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

通过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这个创新不是模仿式创新，而是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指出：“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2024年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深刻论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越来越接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 and 创新能力，更多依靠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通过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给定总投入的条件下，形成更多更好的产出。新质生产力的“新”，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创新、企业创新、行业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培育新质生产

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也可以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既可以是新兴产业，如绿色能源、量子通信等，也可以是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传统产业，如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等。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整体发展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产业化应用蓬勃发展，人工智能产品在医疗、商业、通信、城市管理等方面得到快速应用；在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兴领域，我国都有广受国际产业与市场关注的产品。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趋势：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同时需要看到，当前一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由于其体量和规模还不够大，量的积累还没有引起质的有效提升，因而还没有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比如，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6.3%。同时，房地产等一些传统产业仍处在结构性调整之中，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全要素生产率。这表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刚刚开始，还任重道远，除了强化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外，当前尤其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能够激发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制度创新。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需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靠自身能力创新所有技术与产业。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与国际学术界、产业界的交流合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的对象、渠道与方式，同时在一些受到限制的领域

集中力量，独立自主开发新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各地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而不能盲目上项目。比如，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朝阳产业，但如果不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盲目为企业提供支持，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内卷式竞争。各地必须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严格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还给市场，让企业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决定产业发展策略。

大力激发民营企业信心和活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并日益显著，在新兴产业中最为活跃、参与国际竞争最为积极，因而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目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有42万多家，占比超92%；在出口强劲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一半。要扎扎实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同时提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政策和法治环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金融和科技创新具有天然联系，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金融制度安排来帮助控制。为此，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对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作出系统性、创新性安排，为科技创新提供与其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实现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具体来看，要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同时，遵循科技金融的发展规律，提高监管的包容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公共资源主要是指具有公有性、公益性的资源、资产、项目等，通常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对于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公共资源配置，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比如，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加强边疆和民族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等。

公共资源交易主要是以市场化方式对公共资源进行配置，其涉及利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指出，“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要坚持应

成了交易从分散到集中、规则从分立到统一、信息从分割到共享、系统从分设到联通的新局面，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推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约束和规范交易行为等方面的作用持续显现。同时也要看到，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还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交易时受到不公平对待。例如，一些部门和单位以组织形式、企业规模等为由对民营企业实行差别对待，评审规则向本地企业、大型企业倾斜，设定与交易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资质、业绩、奖项等条件。

我国民营企业量大面广，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稳企业的重要对象，在推动发展中发挥着不

平等获得交易机会，才能为其生存发展注入“源头活水”。今年5月20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应当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依法平等对待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不得有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的行为。”这在法律层面，对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平等对待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提出明确要求，必将为民营企业公平参与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市场竞争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以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实施为契机，优化民营经济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做好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打造统一规范、信息共享、阳光

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就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为做好民营经济工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必将肩负更大的使命、承担更重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是民营企业开拓市场空间、实现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竞争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品牌信誉的重要推动力。应当看到，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单个体量较小、议价能力不强，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交易项目减少，一些民营企业获得项目的机会有所减少，利润有所降低，经营和发展面临困难。只有采取针对性措施，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进一步破除市场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强化公正监管，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效益，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具体可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加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加强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规范竞争秩序，保障各类经济组织平等获得交易机会。二是持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推进电子化、智能化交易，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降低交易成本，为各类经济组织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高质量平台支撑，以平台的智能高效推动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效益。三是强化公平竞争监督执法，加大交易信息公开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打造数字化监管网络，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纠正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妨碍公平竞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维护各类交易主体合法权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华侨纽带：融汇丝路文明对话，助力谱写“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新篇章

张闻

1937年，民革创始人陈劭先与华侨领袖陈嘉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并肩发起“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8年，民革前辈李济深在香港铜锣湾与侨领黄伯才共议《告海外同胞书》，以家书凝聚海外赤子心；2023年，雅万高铁的笛声划破爪哇岛的晨雾——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雅万高铁的推进凝聚了民革在跨国协商、侨胞动员中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敦煌莫高窟的数字飞天舒展衣袂，掠过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穹顶，潋升的篆书光影流转成“海内存知己”的诗意长卷。从抗战烽火到数字丝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革与华侨血脉相连，以共筑命运共同体为笔，书写文明互鉴的新篇。

历史解码：从“家国情怀”到“民心归途”

早在民革成立之前，其先辈们便与海外侨胞在救国图存的历史浪潮中结下紧密合作的不解之缘。1934年，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起者之一的蔡廷锴流亡至新加坡。这位淞沪抗战的英雄，在南洋200余场抗日宣讲中，总是带着两样东西：一是抗战士兵的血衣，二是侨胞寄回的侨批。“批银五元，归守国门，倭寇未灭，毋念高堂”，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凝结着南洋侨胞的赤子之心。受其感召，马来西亚侨领胡文虎于全面抗战爆发后慷慨输将，累计为抗日军队捐赠200余架飞机及大量药品。这种“以情聚侨、以史铸魂”的精神，是民革成立后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推动侨务工作发展提供了历史启示——正如泛黄侨批上的斑驳字迹所见证：跨越山海的家国共鸣，始终是联结华侨与祖国的精神纽带。

1948年，在香港铜锣湾斑驳的骑楼深处，民革创始人李济深与马来西亚侨界领袖明理相晤。庄明理受陈嘉庚等南洋侨领委托，代表海外侨胞与民革就支持国内民主运动、参与新政协筹备等

议题深入磋商。当《告海外同胞书》的墨迹晕染香江晨雾，字里行间奔涌的不止是檄文，更似千帆归港的螺号——民革号召海外侨胞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凝聚力量投身新中国建设。庄明理等侨领积极响应该倡议，推动南洋侨团与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密切协作关系。至此，新政协的桅杆刺破云翳，南洋十万华侨化作星斗，缀满共和国初诞的天幕。

丝路共生：从“银信传情”到“以侨架桥”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民革持续深化侨务纽带功能，推动华侨的文化基因焕发新活力：泉州“海丝数字侨批”平台上，16国华侨共修云端族谱，将“银信合一”的诚信精神凝为跨境电商的信用凭证。一纸泛黄的侨批，承载的不仅是汇款数字，更是“一言九鼎”的千年信义，而这份信义在今天化作了数字丝路上的信任基石。这一实践既传承了华侨“信义为先”的文化基因，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间力量的统筹协调。

台州玉环依托“以侨架桥”机制，与匈牙利罗兰大学“丝路国学堂”合作开展云端中文教学，累计举办“云课堂”180余场，覆盖节气、生肖、民俗等专题，让华裔学子在趣味中体悟汉字之美。云端课堂里，华裔学子轻吟重阳古诗，指尖划过屏中汉字的横竖撇捺；澳大利亚华裔少年透过镜头编织非遗鱼灯，光影流转间，东方美学悄然浸润异国街巷。菲律宾宾与玉环学子隔空对诵《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童声清越，文化的根脉在云端悄然相连。

时代新篇：从“数字传灯”到“范式重构”

日月盈昃，时序变迁。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奔涌，中国共产党的“数字中国”战略为文化传承开辟了新路径，而民革的创新实践为人文交流范式的建构贡献

了新的智慧：2023年，民革中央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推动社会共建，助力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的提案》，明确提出构建多方协作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生态。这一战略构想在“数字敦煌”项目中得到生动实践：敦煌研究院邀请海外华裔学子参与壁画修复AI模型的训练，千年前的飞天衣袂在算法中翩然复原，华裔青年也在代码与色彩的碰撞中，寻找到文化认同的“数字密钥”。历史的精华裹挟涉水，中国共产党的前瞻性、民革的创新探索与华侨的文化自觉生动结合，让千年丝路精神在数据洪流中生生不息。

当千年丝路驼铃化作数据洪流中的回响，范式重构的本质在于打通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认知闭环：即文化认同需从传统器物传播的隐性积淀转向数字时代的主动建构，正如柳青瑶将琵琶艺术创新转化为青年群体的“文化芯片”——《唐三彩》通过琵琶弦乐实现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在主体协同维度，应赓续唐代万国博览会精神，通过“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等平台构建“政府主导、学界支撑、民间发力”的三维协作网络，再现“百川归海”的统合力道。

从铜锣湾摇曳的烛火到北部湾跃动的数据流，民革与海外华侨的互动历程深刻表明：文明对话的真谛，从不栖居于恢弘的史诗，而在泛黄侨批的褶皱深处，在斑驳银信的墨痕之间，在新一代青年不懈奋斗的汗水中。当我们以“侨脉”为棱镜，折射的不仅是民革穿越周期的坚守，更是“一带一路”最具温度的情感编码。民革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五洲侨胞保持着血脉共振，从唐人街的晨曦到科技园的星辉，关切着跨文化生存的每道年轮。通过“文化雅集”织就乡愁经纬，借“商贸云洽”架设共赢桥梁，以唐宋海丝遗韵与数字时代质感的对话范式，在人类文明的天幕上，编织出命运共同体的星河图谱。